

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历史考察 (1956-1989)

古 萍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 苏丹伊斯兰运动是塑造、推进和影响苏丹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而 1956 至 1989 年则是其发展、崛起的关键时期。自 1956 年独立以来,苏丹难以实现长期且持续的统治,见证了近 30 年的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执政。伊斯兰是排斥现状和令政府失权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通过建立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宪章阵线及全国伊斯兰阵线三大政治组织,成功建立了基于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了从组织到国家的重要转型。关于这一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发展演变四点思考:苏丹环境与苏丹伊斯兰运动之间相互作用;以革新为内核的时空观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关键;政治组织与协商原则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保障;伊斯兰运动在苏丹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既有贡献又有局限。

关键词: 伊斯兰运动;苏丹;政治演进;政治组织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苏丹伊斯兰运动研究”(2019SJA1831)

苏丹伊斯兰运动发端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萌芽于 1945 至 1956 年近代英埃共管苏丹时期,而 1956 至 1989 年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则是其发展、崛起的关键时期。自 1956 年独立以来,苏丹难以实现长期且持续的统治,见证了近 30 年的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执政。此间,伊斯兰是排斥现状和令政府失权的重要来源,苏丹国内各个集团的利益和议题往往跟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挂钩。苏丹伊斯兰运动通过建立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宪章阵线及全国伊斯兰阵线三大政治组织,成功建立了基于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了从组织到国家的重要转型。本文主要考察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及其形成的三大政治组织。

一、第一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穆斯林兄弟会

第一届议会制政府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处于短暂的扩张阶段。“从活动主体看,吸收了从埃及大学毕业的苏丹学生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苏丹分支;从活动范围看,作为运动先驱的学生群体陆续毕业,走向社会,成为苏丹政治团体领导层,跨越了学校机构这一初期阵地;从活动方式看,开始通过所有官方和非官方途径提升苏丹领导人和群众对伊斯兰的政治认识。例如,第一次在报纸和公开演讲中宣传号召。”^[1]

第一届军政府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则处于沉寂阶段。第一届议会制政府仅维持两年,1958 年 11 月 17 日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和一群苏丹军官便发动军事政变。“因忧惧军政府的压迫政策,为了确保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存续及成员安全,这一时期的伊斯兰运动不得不由公开转入秘密,从政治运动转向文化工作,从号召实践转为理论探讨。阿布德军政府后期,苏丹伊斯兰运动有所扩展,在继续发挥学生运动领导作用的

基础上,广泛团结其他社会阶层,并加入军政府的反对派政党,成为对抗当局的首要力量,在推翻苏丹第一届军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1]但是,这一时期的苏丹穆斯林兄弟会尚无法像其对手苏丹共产主义组织那样快速扩张。^[2]

二、第二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伊斯兰宪章阵线

1964 年 10 月阿布德军政府倒台,苏丹进入第二届议会制政府时期。随着声名和实力的不断提升,为了应对苏丹国内快速发生的变化,苏丹伊斯兰运动已不再满足于自发的民众运动,决定联合其他伊斯兰团体,形成统一的政治运动,于是 1964 年 12 月 6 日伊斯兰宪章阵线建立。自此,苏丹伊斯兰运动迅速发展。严格意义上说,伊斯兰宪章阵线是苏丹伊斯兰运动的首个政治组织,旨在实现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伊斯兰化,反对一切违反伊斯兰教义及提倡无神论的政权。在苏丹伊斯兰运动实践历程中,伊斯兰宪章阵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第二届议会制政府自由且动荡的时势背景下,伊斯兰宪章阵线取得进一步发展,其成就在于三方面。其一,将 1965 年和 1968 年议会选举作为政治参与路径,推进宪法机构的伊斯兰变革;通过立法机构和制宪会议实现政治渗透并动摇了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其二,将革新理念融入伊斯兰和舒拉协商制度的宣传之中。相较于安萨尔教派、哈特米亚教派等,哈桑·图拉比呼吁根据国家需要和国情创新实践舒拉制度,而非模仿。这种动员征募策略更具灵活性、现代性、宽容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伊斯兰运动由有限精英团体扩大为广泛群众支持的实体。其三,制定书面章程。“1965 年初伊斯兰宪章阵线发布《伊斯兰运动宪章》,作为其纲领性章程,内容包括倡导伊斯兰制度的原因、宪法制度、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以及根据沙里亚法确立伊斯兰社会制度四章。”^[1]

1969 年 5 月 25 日,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上校发动军事政变,苏丹进入第二届军政府时期。因在政体、宪法

和南方问题上立场相悖,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再一次受到军政府的压制。尼迈里深受埃及纳赛尔及其领导的泛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3]。其目标是建立总统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成立政治组织“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以取缔教派政党林立的议会。在宪法问题上,尼迈里打算制定一部永久宪法以取代经过多次修正的1956年临时宪法。制宪则涉及颇具争议性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身份问题和宗教问题,在1973年5月8日颁布的世俗宪法中,苏丹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且其第16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未将沙里亚法作为立法的主要来源。在南方问题上,1972年3月27日,苏丹政府与南方“南苏丹解放运动”签署《亚的斯贝巴协定》,结束了长达17年的南方内战。尼迈里政府与南方的和解引起了北方穆斯林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满。^[4]而伊斯兰宪章阵线与其他宗教保守团体则渴望通过政变形式颠覆尼迈里政府,于1971年7月和1976年7月发动了两场未遂政变。

在经历八年的对抗之后,苏丹伊斯兰运动与尼迈里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折。苏丹伊斯兰运动放弃以往的立场,开始对政权采取缓和政策。相应地,在两次未遂政变后,尼迈里也对反对派即1974年由伊斯兰宪章阵线与其他反对尼迈里的力量联合成立的国民阵线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为其进一步开放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以寻求民族和解。谢里夫·辛迪与哈桑·图拉比主动响应尼迈里政府的民族和解。苏丹伊斯兰运动此次思想理念的转变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尼迈里政府正处于上升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并不占据任何优势。得益于一系列激励措施和大型开发项目,如《苏丹农业发展基本纲要》、《1970年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及开凿琼莱运河计划、雪佛龙海外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勘探计划等,苏丹国内经济局面好转并初现繁荣,而长久未决的南方问题也基本解决。二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将民族和解作为政治渗透的工具,借以重建穆斯林兄弟会,并将其扩大为一个更为广泛、更具实力的舒拉组织结构,为建立基于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而准备。尽管民族和解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国民阵线,如萨迪克·马赫迪并不接受和解,但总体来看,苏丹伊斯兰运动的政治经济实力大有提升,尤其是在政治实力、经济基础、成员招募及伊斯兰教育普及方面。

3、第三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全国伊斯兰阵线
尼迈里政府后期,日益蔓延的动荡局面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契机。高利率的国际贷款、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等使得苏丹经济迅速恶化,加之尼迈里本人信仰观念的突变,主张恢复伊斯兰信仰,如在1983年9月,宣布在苏丹全国实施沙里亚法即“九月法令”,引发了苏丹国内政治危机,这对于此前的《亚的斯贝巴协定》是致命一击,南方不再支持尼迈里。1985年4月,为了团结全国所有的伊斯兰力量,图拉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同月内,全国伊斯兰阵线成立。其主要成员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伊斯兰主义者、苏菲组织和一些部落领袖。全国伊斯兰阵线

的前身正是前文所述反对尼迈里政权的国民阵线,是乌玛党、民族联合党、民主统一党和伊斯兰宪章阵线的联盟。^[3]

相较于伊斯兰运动成立的其他政治组织,全国伊斯兰阵线有着新优势和进一步发展。从组织结构看,首先是形成了明确的内部组织架构,包括国民大会、最高权力机构舒拉协商、执行机关、秘书处四级组织系统。其次是规定了内部组织系统的召集时间和人员晋升推选机制。国民大会、舒拉协商和执行机关分别是每三年、每六个月和每三个月召集一次。而人员晋升推选机制,则是从基层向高层定额选举推送,由大会选举的361名成员构成舒拉协商,舒拉协商推选76名成员构成占比近67%的执行机关成员,而秘书处则由秘书长哈桑·图拉比主持的国民大会推选构成;从征募策略看,哈桑·图拉比崇尚务实灵活。一是自下而上建立大规模广泛的社会联盟。在征募成员时更加开放,减少在教育水平或教义认定上的诸多限制,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和女性成员,同时给予分支组织更大的自主权。二是注重发挥宣传和传媒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记者和通讯干部被送往西方名校,并在80年代后期出版了包括官方报纸《旗帜报》在内的七份日报。^[5]三是筹措资金,强化资金保障。全国伊斯兰阵线获得了伊斯兰银行特别是费萨尔银行的慷慨资助。

全国伊斯兰阵线逐渐发展为苏丹颇具影响的政治组织。1985年初,喀土穆爆发了示威与大罢工,国家陷入瘫痪。1985年4月6日,阿布德·拉赫曼·苏瓦尔·达哈卜中将领军官组织发动民众起义,推翻了尼迈里政权,苏丹进入第三届军政府时期。在此后的1986年4月议会选举中,全国伊斯兰阵线成为继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之后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彻底扭转了苏丹伊斯兰运动在1968年议会选举时所处的边缘境地。1986年5月15日,在选举中获胜的赛义德·萨迪克·马赫迪宣布成立联合政府,苏丹进入第三届议会制政府时期。萨迪克·马赫迪继承了往届政府相同的严峻的治理挑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腐败问题、南方问题、宪法问题、经济问题等交织而成的混乱局面。^[6]为了团结和壮大力量,优柔寡断的萨迪克·马赫迪曾分别选择与民主联合党、全国伊斯兰阵线组成联合政府,这一时期以全国伊斯兰阵线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日渐增强,尤其是在萨迪克与其联合重组内阁和政府时,图拉比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伊斯兰阵线的其他成员得到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内政、司法和社会事务部部长职务,乌玛党—全国伊斯兰阵线轴心也越来越强硬,民主联合党则滑向边缘。^[5]

然而,萨迪克·马赫迪随情势而改变立场的作风忽视了教派对立的现状,并触及了伊斯兰主义者最为关注的宪法问题,最终推动全国伊斯兰阵线走上军事政变的道路。随着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力量迅速崛起,苏丹政府在南方的军队不断失守。苏丹南部发生的毁灭性内战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因为北部的大部分资源被用于战争。为了终结南方的军事行动,萨迪克批准了民主联盟党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

的和平协定，冻结了沙里亚法，开始筹备新的宪法大会。全国伊斯兰阵线将冻结沙里亚法视为反伊斯兰举措，图拉比和部分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决定在数月内采取军事行动，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以取代现政府，即 1989 年以巴希尔为首的军事政变。^[7]自此，苏丹伊斯兰运动进入高潮，巴希尔政权建立后，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苏丹成为了激进的实施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

四、关于这一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发展演变四点思考

第一，苏丹环境与苏丹伊斯兰运动之间相互作用。在苏丹重要变革中，倡导伊斯兰成为获取合法性和征募动员的主要来源。同时，苏丹重要节点的每一次现实考验又促使伊斯兰运动产生新变化。苏丹伊斯兰运动发生在地理环境、宗教教派、种族部落等多样且复杂的苏丹环境中，由于其空间特性及特殊的宗教传统，刻上了独特的地区烙印。这一时期的苏丹伊斯兰运动内生于苏丹国家治理过程中激烈敌对的政治斗争，一方面因为现世统治的奢侈腐化、争权夺利与奉行苦行功修的苏菲传统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则源于多元族群、宗教、教派之间差异和矛盾的显现。基于苏丹环境，苏丹伊斯兰运动采取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其思想奠定、组织形式、运动纲领与苏丹的历史、政治、现状、需求、问题相呼应。而随着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该运动也更多地参与苏丹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

第二，以革新为内核的时空观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关键。苏丹伊斯兰运动的理论设计师哈桑·图拉比曾撰文，如《教法本原革新》、《伊斯兰思想革新》、《统一与自由问题》、《当代伊斯兰国家的组织形式》等，谈及革新或是提出革新宗教的方法，并提出了以革新为内核的宗教时空观。他认为，伊斯兰真理是固定的，但穆斯林思想是灵活的，随着时空变迁不断更新，但仍与其本源保持联系，通过实践的方式得以延续。哈桑·图拉比的这种宗教理念既是其双重知识背景的思想表征，同时也是其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寻求的宗教高论与世俗实践的调和路径。^[8]在 1956 至 1989 年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僵化地回归传统无疑加剧与现代世界的抵牾，而创新的宗教政治理念与实践，则有助于调和伊斯兰教价值观与苏丹现实政治问题的利益需求。

第三，政治组织与协商原则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保障。苏丹伊斯兰运动早期通过自发的学生运动和宣教的方式传达给受众，随后不断加强组织形式，凭借组建三大主要政治组织，成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丹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组织活动中，苏丹伊斯兰运动并不认同传统伊斯兰运动的从属制度，即将“效忠”作为伊斯兰运动关系的首要原则，而是遵循集体领导之下的“协商”原则。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效忠会打破统一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对当地的宗教信仰产生不利影响。世界上的伊斯兰运动首先要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共同思想及使人产生共鸣的经验”^[9]。这种理念也体现在苏丹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之中，通过互联互

访、互助互信的协商制度，“苏丹伊斯兰运动和阿拉伯国家、亚非欧国家进行的其他国内运动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世界伊斯兰关系”^[9]。

第四，伊斯兰运动在苏丹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既有贡献又有局限。伊斯兰教是推动苏丹社会变革的活跃力量，但是从作用结果看，苏丹伊斯兰运动对既定政权构成一定挑战，其在现代国家治理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有局限性，党派主义、苏菲道路、意识形态斗争、分裂思想都是以牺牲联盟与统一为代价。而在苏丹伊斯兰运动成功崛起并建国后，却“无法在一个有利的地方和区域气候下带来成功的治理模式”。正如喀土穆苏丹研究中心主任希德尔·易卜拉欣·阿里提出的系列质疑“伊斯兰如何治理现代国家，是否具备这一能力？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的现代伊斯兰国家是何形态或模式？伊斯兰体制下经济如何运行、军队力量如何组织？以及其与资本、私有资本、国家资本的关系是什么？”恩格斯曾指出，“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而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陈旧经济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而伊斯兰教世界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

参考文献

- [1] 阿里·伊萨·阿卜杜·拉赫曼：“从组织到国家的苏丹伊斯兰运动（1949-2000）”，喀土穆，伊斯兰运动办公室出版物。
 - [2] Edward Thomas, “Islam’s perfect stranger the life of Mahmud Muhammad Taha, muslim reformer of Sudan”, published in 2010 by I.B.Tauris & Co Ltd,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African studies 26.
 - [3] 罗伯特·柯林斯著，徐宏峰译：《苏丹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 9 月。
 - [4] 刘鸿武、姜恒昆：《列国志：苏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6 月。
 - [5] Mustafa A. Abdelwahid,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Sudan, 1945-1989”,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2008.
 - [6] Peter K. Bechtold, “More Turbulence in Sudan”, in Sudan, ed. John O. Vol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7] Don Petterson, “Inside Sudan: Political Islam, Conflict, and Catastrophe”, Westview Press, 1999.
 - [8] Abdullahi Ali Ibrahim, “A theology of modernity: Hasan al-Turabi and Islamic renewal in Sudan”, Africa Today; Bloomington Vol. 46, Iss. 3/4, (Summer 1999).
 - [9] 哈桑·图拉比著：《苏丹伊斯兰运动的纲领、成就与发展》，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第 3 版，2009 年。
- 作者简介：古萍，1986 年 8 月，女，汉，安徽芜湖，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阿拉伯国别区域研究。